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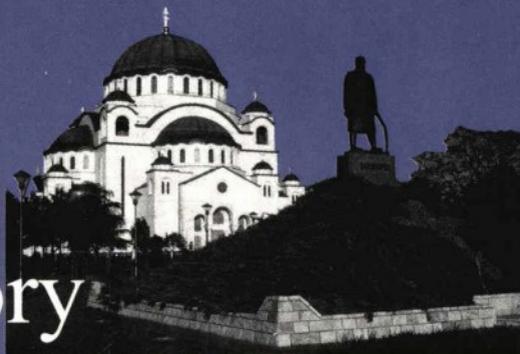
世界历史文库
World History Library

doosriver 文川网
古籍书城
入驻商家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南斯拉夫史

约翰·R·兰普 著 刘大平 译

Yugoslavia
as History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Yugoslavia as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ww.cambridge.org

ISBN 978-7-5473-0553-9



9 787547 305539 >

定价：68.00元



世界历史文库
World History Library

南斯拉夫史

约翰·R·兰普 著 刘太平 译

Yugoslavia as History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9 - 2010 - 050 号

Yugoslavia as History: Twice There was a Country 2nd Edition / by John R. Lampe / ISBN: 978 - 0 - 415 - 77572 - 4

Copyright © 201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本书原版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并经其授权翻译出版。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0 by Orient Publishing Centre, China Publishing Group

This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throughout Mainland of China. No part of the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本书中文简体翻译版授权由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独家出版并限在中國大陸地区销售, 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发行本书的任何部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斯拉夫史 / (美) 兰普著; 刘大平译.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3. 1

(世界历史文库)

ISBN 978 - 7 - 5473 - 0553 - 9

I. ①南… II. ①兰… ②刘… III. ①南斯拉夫—历史 IV. ①K5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81931 号

责任编辑: 张爱民

责任印制: 尚小平

装帧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邮政编码: 200336

电 话: 021 - 62417400

印 刷: 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 × 960 毫米 1/16

印 张: 39.75

字 数: 540 千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473 - 0553 - 9

定 价: 6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世界历史文库》出版前言

在全球化时代,关注世界各国各地区文明发展的源流、现实和未来,不仅仅是新世纪人文学科的一个重点课题,也是许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强烈兴趣所在。甚至,关注别国热点,不亚于关注自身状况,也已经成为心态开放、视野开阔的许许多多当代中国人的一种精神生活方式。然而,至今我国尚未出版过一套相对完备的世界国别史及地区史丛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业虽然陆续推出过一些国别史、地区史,但既无规划,也很分散,而且主要集中在英、法、美、俄、日、德等大国,覆盖面过于狭小,更遑论完备与权威了。为此,中国出版集团公司通过深入调研,邀约史学界专家进行多方论证,精心策划组织出版这套《世界历史文库》。

《世界历史文库》主要选收国别史、地区史的通史性著作,以国别史为主体,适当辅以地区史。计划共出版80种,2年内出齐。文库编辑委员会特邀我国世界史学界著名学者专家担任学术顾问,精心遴选著作。编选者和学术顾问一致认为,每个国家、地区的历史只选一种著作,因而要求此一种应是在学界已获得广泛定评的上乘之作,且最好是最新成果,作者应为著名史学专家,原出版者也应知名的出版机构。原著使用的语种主要是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日语等,中文译者应基本上是史学专业人士或具有较高史学修养的翻译家。总之,学术性、权威性、完备性、可资借鉴性以及可读性,是《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所追求的目标。

显而易见,入选《世界历史文库》的著作,只是给读者们提供了关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历史一种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在史学领域里,治史者所拥有的材料、眼光、立场以及才学识见的不同,必然导致历史研究结论与叙述状态的迥异,相信读者们会在阅读

研究时注意加以辨别。上下数千年,人类一直在探寻自己的历史,寻找“信史”,追求“良史”,以期获得历史的真相和启悟。正如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所说:“出乎史,如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治史、读史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并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人类认识自身与寻求发展的需要。因而,寻找“信史”——要求史家叙述历史时具有很高的可信度,是其正当的要求。而追求“良史”——希望史家叙述历史时,在可信的基础上能正确揭示历史的内在真相与内在规律,达到“知兴替”而经世致用的目的,则是其最高的要求。宋代曾巩在《南齐书目录序》中曾提出“良史”的标准:“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就是要坚持提供“信史”的原则,努力追求“良史”的境界,竭诚为我国史学研究者提供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并满足各界读者了解世界各国各地区历史的需要,增进国际文化交流,为我国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贡献。这是编辑委员会和各位学术顾问的共同心愿和追求。

编辑出版工作不周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批评指正!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

致 谢

xiii

1987年从威斯康星大学退休之后,迈克尔·彼得罗维奇(Michael Petrovich)打算着手写作一部南斯拉夫史。这个南斯拉夫曾作为一个国家和一种主张存在过。次年我的导师之一迈克尔·彼得罗维奇去世,从而中止他的这项调研工作,即调研一个消逝的国家和一种被击败的主张。弗雷德·辛格尔顿(Fred Singleton)也没有见证到把南斯拉夫的瓦解列入《南斯拉夫人民简史》的最新版本。1985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南斯拉夫人民简史》,作为其1968年版斯蒂芬·克里索尔德(Stephen Clissold)编辑的《南斯拉夫简史》的后续。

我在1993年开始准备写作本书,部分出于对这一因迈克尔·彼得罗维奇的提前退休而未完成的工作的责任感。但是我也肩负其他责任。弗雷德·辛格尔顿和彼得罗维奇的著作摆脱了研究这些领地和民族的根深蒂固的英美传统,这应该接受我的充分感谢。当然,英国的传统更悠久,它始于人类学家亚瑟·埃文斯(Arthur Evans)在1875年到达波斯尼亚,并且通过菲莉斯·奥蒂(Phyllis Auty)、斯特万·帕夫洛维奇(Stevan Pavlowitch)和其他人的著作延伸到弗雷德·辛格尔顿所建立的布拉德福大学南斯拉夫研究小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代美国专家先驱涌现出来。除了迈克尔·彼得罗维奇和我应感激的明尼苏达大学的蒂奥法尼斯·斯塔夫罗(Theofanis Stavrou)在巴尔干史方

面的基础训练和我在威斯康星大学的主要导师龙多·卡梅伦(Rondo Cameron)在经济史方面的基础训练之外,我应感激同查尔斯(Charles)、巴巴拉·耶拉维奇(Barbara Jelavich)、彼得·舒加(Peter Sugar)、韦恩·武契尼奇(Wayne Vucinich)和乔治·霍夫曼(George Hoffman)的长期交往。我还曾得益于更年轻的美国学者的著作,他们人数众多,以至于不能在这里列举,他们远远超出了在注释中引用的可观数量。

xiv 也应当提到过去 20 年之内出现的年轻一代的德国历史学家。他们已恢复其国家在东南欧学术研究方面在 20 世纪早期所享有的突出地位。柏林大学和莱比锡大学的霍尔姆·桑德豪森(Holm Sundhaussen)和沃尔夫冈·霍普金(Wolfgang Hopken)的著作已经各自证明对我特别有用。罗兰·舍恩菲尔德(Roland Schonfeld)指导下的、设于慕尼黑(Munich)的东南欧协会(Südosteuropa-Gesellschaft)的刊物和活动也已证明对我特别有用。

我自己同前南斯拉夫的联系始于 1965 年。作为一位年轻的外交官,到 1966 年我一直任职于美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在 1969—1970 年,作为一名研究生,我因为博士论文研究返回贝尔格莱德。从那时以来,作为马里兰大学历史学教授并且 1987 年以后作为华盛顿的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东欧研究室主任,进一步的研究已经让我无数次回到萨拉热窝、卢布尔雅那、萨格勒布和贝尔格莱德。在前南斯拉夫战后历史学家的先驱一代之中,我广泛得益于卢布尔雅那的扬科·普莱特斯基(Janko Pleterški)、萨格勒布的米里亚娜·格罗斯(Mirjana Gross)和留博·博班(Ljubo Boban)、贝尔格莱德的丹妮卡·米利奇(Danica Milic)和布兰克·彼得拉诺维奇(Branko Petranovic)的著作。同时,他们和被提及的任何一位西方学者都不应当对本书承担责任。

因为我同前南斯拉夫的长期联系,一项进一步的职责存在于这些章,即如何更具体地将前南斯拉夫暴力终结的未结束的悲剧和其历史连接起来,尽管其起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相关但独立的各民族和

地区,并且其起源于对 1918—1941 年、1945—1991 年两个南斯拉夫国家和主张的可行性寻求。我把寻求这些联系而不是把寻求这两个南斯拉夫的更全面的历史,作为我的主要任务。歪曲经由选择的资料去为南斯拉夫的所有不幸而控诉一方或另一方,这在前南斯拉夫和后继国家中起了有害作用。贝尔格莱德历史学家安德烈·米特罗维奇(Andrej Mitrovic)已经恰当地把这种歪曲称为“准历史”。这种情况激励了我。在西方世界,这种矛盾控诉的混合体已经鼓励了“古老的对抗”观念。虽然这种观念在历史上是错误的,但是这种观念仍然有助于拒绝承认组成南斯拉夫的各民族为欧洲人,并且将他们当前的冲突描述为原始问题。

这本简短的著作旨在从大量可得到的证据、学术研究和外交报告中集合足够的线索,去将两个南斯拉夫和它们的起源连接起来、将它们的实力和其弱点连接起来,并且将其血腥的失败和完整的历史背景连接起来。本书期望为学者们提供颇具有启发的新的分析或解释。它也应当提及有利害关系的公众和负责任的公职人员及大学生。时势要求这样一本著作是可理解的、有权威的和有独创性的。补充书目主要是英文的并且也有德文的。其建议表明,从总体上看,与关于前苏联集团任何国家的著作相比,该著作的正文更为全面。这些注释,得感谢前南斯拉夫的所有组成部分所遗留的相当多的学术著作,并且感谢驻贝尔格莱德的英美大使馆和驻慕尼黑的“自由欧洲之声/自由之声”(Radio Free Europe / Radio Liberty)的有益报告所留下的档案。这些注释也寻求确认那些遗留许多重要历史争端的互相抵触的看法,特别在可靠的原始资料缺乏的地方,例如关于两场世界大战的看法还卷入了合法的争议。通过这些争议,这种叙述找到了自己的方向。这种叙述得出结论或省略细节,而一些严肃的学者和许多来自前南斯拉夫的、拥有当地经历的人士无疑将在这些细节中发现争议。我曾尝试把自已在那里作为局外人的经历与最广泛的学术观点以及我能够集合的原始资料结合起来,并且我已经尽力做到公平。

最后,我希望表达一些具体的感激之情。像伍德罗·威尔逊国际

学者中心的副主任小塞缪尔·F. 韦尔斯(Samuel F. Wells, Jr.)一样,马里兰大学历史系的历届主任理查德·普里斯(Richard Price)、克利福德·福斯特(Clifford Foust)和詹姆斯·哈里斯(James Harris)曾提供了始终如一的鼓励。我感谢《东欧思潮研究》(*Studies in East European Thought*),该期编辑克里斯托夫·尼日(Kristof Nyiri)在论文《南斯拉夫国家观念的失败》(《东欧思潮研究》1994年总第46期,第69—89页)中提供了把我的最初建议传播到更广泛主题的机会,并且感谢拉塞尔·O. 普里克特(Russell O. Prickett)和柳比萨·艾丹奴维奇(Ljubisa Adamovic)在我们的合著《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南斯拉夫和美国的经济关系》(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杜克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中所表现的见识。也应当感谢1993年在萨格勒布和卢布尔雅那同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就被提议的目录进行的圆桌讨论,以及同年与贝尔格莱德和布达佩斯历史学家的非正式会议。

该书的二手资料或原始资料来自一长串单位,这些单位的工作人员全都一贯乐于助人。这些地点是在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档案馆(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在伦敦的公共档案馆(the Public Record Office)、在慕尼黑的“自由欧洲之声/自由之声”档案馆、在贝尔格莱德的“当代史学会”(the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History)和伊利诺伊大学、马里兰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威斯康星大学的几个图书馆。非常感谢1993年“自由欧洲之声”对我在慕尼黑的一个月研究的支持和1994年“人文科学学会”(the Institute for Human Sciences)对我在维也纳的一个月写作的支持。

在该项工作的后期阶段,我获得了来自各种挑剔的读者们的重大帮助,他们是:盖尔·斯托克斯(Gale Stokes)、丹尼森·拉西诺(Dennison Rusinow)、萨布丽娜·佩特拉·拉梅(Sabrina Petra Ramet)、德拉戈·洛克桑迪奇(Drago Roksandic)、尼古拉斯·米勒(Nicholas Miller)、克莉丝汀·亨特(Kristin Hunter)、安妮塔·贝克·兰佩(Anita Baker Lampe)和剑桥大学出版社征求的几位匿名读者。他们不分担我对最终文本所负有的任何责任。已出版的该书也受益于克莉丝汀·

亨特和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审稿工作、乔纳森·金博尔 (Jonathan Kimball)和菲利普·伯克尔巴赫(Philip Birkelbach)编制的统计表,以及弗吉尼亚州阿灵顿的鲍林制图公司的拉里·A. 鲍林(Larry A. Bowring)绘制的地图。印第安纳州南本德的莉丝·安·索尔(Lys Ann Shore)出色地编写了索引。如果没有安妮塔·贝克·兰佩的坚定支持,特别是在周末和晚间写作的一年半期间的坚定支持,那么我本人不可能完成该书的写作。

第二版前言

xvii

在 1993 年,我怀着一种悲哀的义务感开始写作本书的第一版。似乎对大多数西方观察家而言,与邻近的苏联集团拥有的任何成员相比,前南斯拉夫的暴力终结失去了超越战后共产党政权限制的一个更好机会。对全东欧而言,1989 年之后,当这个机会到来时,南斯拉夫已经成为“我们只能在历史书中阅读而知的一个地方……它随风而逝”。我试图把我的历史书和《飘》(*Gone with the Wind*)的怀旧分开。但是我也寻求置身事外于后继国家中的一种可以理解的倾向。这种倾向就是,将其多数种族和领土看做与两个共同国家几乎没有过去的联系——当然是没有什么建设性的联系。太多的西方观察家都有这种倾向。

种族战争和混乱的过渡现在已经持续了整整 10 年,这些后继国家努力使其自身同那些真实存在的联系摆脱干系。这些努力已给这些过渡贴上标记。它们的斗争为该书第二版提供了主要理由。该书第二版关于 1991—1999 年冗长的新章节记录了后继国家中的一些进步和成绩,但却留给我另一个喜悦少于悲叹的十分糟糕的任务。在着手写作最近几年的事件时,我不得不依赖于筛选的二手资料和这 10 年间我对该地区的 12 次访问所作的观察报告。历史学家更喜欢依靠的关于第一南斯拉夫的原始资料仍有待充分研究,关于第二南斯拉夫的原始资料仍有待完全公开。尽管几乎完全没有 20 世纪 90 年代的原始资料,

但是即使在科索沃最近发生的悲剧之前,对整个欧洲和美国而言,在防止更多的种族战争,并且在重新联合整个东南欧方面,死亡、流亡或离散的代价的确太巨大,并且赌注太高,以至于不能避免面临我也称之为即时历史的挑战。

就我在修订第一版“序言”和 11 个章节中曾付出的相当大的努力而言,相当多的理由继续客观存在着。近来在一个继续使用“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名称的后继国家中爆发的战争,要求更加重视科索沃、马其顿和黑山的民族史。在篇幅允许和一种共同命运或民族间关系的某种关联存在的地方,已经纠正了我对独立文化史的有意识忽视。我已特别注意去阐明这些简化部分,并纠正最频繁出现于最初的世纪跨越章节中的简单事实错误。这有益于那些希望在此基础上从一种或另一种独特视角去理解该书后面部分的挑剔读者。

从我的书首版以来,持续缺乏关于前南斯拉夫的任何新的总体研究,同时,除了一大批新闻论述以外,出现了许多关于特定领域和时期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新的研究和学术成就,因此我找到修订该书和增加第 12 章的进一步理由。该新章节的脚注列举了仅仅论述 20 世纪 90 年代的 20 本出版物,扩展的书目增加了 40 本英文或德文书籍。修订后的章节注释包括用各后继国家的现在独立的语言创作的重要的新著作。我也特别乐于借鉴以下九位年轻的美国学者的著作或博士论文:梅利莎·鲍克沃(Melissa Bokovoy)、奥黛丽·赫尔芬特·巴丁(Audrey Helfant Budding)、吉尔·欧文(Jill Irvine)、卡罗尔·丽莱(Carol Lilly)、凯瑟琳·麦卡锡(Katherine McCarthy)、尼古拉斯·米勒(Nicholas Miller)、马尔科·普瑞雷克(Marko Prelec)、韦利科·武贾西奇(Veljko Vujacic)和安德鲁·沃赫特尔(Andrew Wachtel)。1987—1997 年,我为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指导东欧研究计划时,他们每年参加东欧研究计划的青年学者培训研讨会。从而我首次熟悉他们的著作。

也应当提到我曾试图获益于第一版的众多评论、与后继国家学者们关于此书进行的一系列圆桌会议和个别谈话,以及我就一个重要的新档案进行的咨询和该新章节的几位读者。这里不适合感谢大多数的

完全好评,或者继续我与伊沃·伯纳克(Ivo Banac)之间关于我的最初章节是否指南斯拉夫必然崛起的争论。这里更适于特别提到因其详细的评价和建设性的批评而对我最有用的两篇评论,即:詹姆斯·克劳卡(James Krokarc)于1997年在互联网上发表的《哈布斯堡王朝评论》(*HABSBURG Reviews*)中所涉及的评论,以及斯洛博丹·G. 马尔科维奇(Slobodan G. Markovic)1997年10月15日在贝尔格莱德报纸上发表的评论。卢布尔雅那法学院的圆桌讨论、贝尔格莱德的“当代史学会”(the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History)和斯科普里的“马其顿科学和艺术学会”(the Macedonian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Arts)也是有价值的。我有益地查阅了布达佩斯的中欧大学的新“开放社会档案馆”(Open Society Archives)的报纸集。我特别感谢史蒂文·伯格(Steven Burg)、雷纳德·科恩(Lenard Cohen)和查尔斯·英格劳(Charles Ingrao)对该新章节初稿的评论。

本书言论所负的责任仍然是我自己的。我试图进一步澄清公民和学生们寻求理解的这个复杂主题,并且进一步澄清政策制定者已作出或尚待作出的决定。我也试图置身事外于近来经历的、互相抵触的确定性,这种近来经历被记住并且被用做解释过去的一条途径。在解体和战争的10年之后,这样的回忆加深了后继国家的民族分裂,并且它们以其简单性继续去吸引西方观察家。我也不参与为这两个逝去的南斯拉夫辩护,更不必说鼓励第三个南斯拉夫的前景。我只不过试图找出使这两个南斯拉夫联合和分裂的多方历史。它们两者都不值得被留下作为近来回忆的惟一来源。

约翰·R. 兰佩于马里兰的帕克学院

1999年9月

致谢 / 1

第二版前言 / 1

绪言：可行性探究 / 1

第一章 帝国和分裂的边疆(800—1800) / 11

山脉第一,水最后 / 12

短暂的民族国家,长久的记忆 / 16

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多样性 / 24

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多样性 / 32

帝国分裂的例外 / 39

第二章 统一的渴望和乡村的抵抗

(1804—1903) / 46

从伊利里亚省到南斯拉夫的主张(1806—1860) / 48

作为 19 世纪民族国家的塞尔维亚 / 56

作为微型国家的黑山 / 67

哈布斯堡王朝领地中克罗地亚人和南部斯拉夫

人的主张(1860—1900) / 69

波斯尼亚从奥斯曼帝国转到奥匈帝国的统治下 / 77

作为南斯拉夫前哨的达尔马提亚和

斯洛文尼亚 / 81

第三章 新的分裂、南斯拉夫人的纽带和

巴尔干战争(1903—1914) / 84

- 哈布斯堡王朝领地中分裂的发展和党派政治 / 88
- 塞尔维亚上升的声望和 1908 年波斯尼亚危机 / 98
- 巴尔干战争和新的南斯拉夫前景(1912—1914) / 108

第四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一南斯拉夫

(1914—1921) / 120

- 塞尔维亚和“南斯拉夫委员会”(1914—1917) / 121
- 从斯洛文尼亚到塞尔维亚的战时政权 / 126
- 萨格勒布全国委员会和贝尔格莱德的统一 / 131
- 西方政策和边界争端 / 134
- 政治统一的经济障碍 / 140
- 为了单一宪法而举行的引起分裂的选举 / 144

第五章 议会制王国(1921—1928) / 152

- 战前的政治家、新政党和《圣维特宪法》框架
(1921—1926) / 154
- 文化上的联系和经济分离 / 171
- 敌对的邻国和遥远的盟友 / 181
- 灾难性的“十字路口”(1927—1928) / 187

第六章 独裁主义的王国(1929—1941) / 193

- 王室专政(1929—1934) / 195
- 斯托亚迪诺维奇和王室摄政时期(1935—1938) / 208
- 第一南斯拉夫的资产负债表(1921—1939) / 220

从《塞尔维亚族—克罗地亚族协定》到《三国轴心协定》
(1939—1941) / 229

第七章 世界大战和内战(1941—1945) / 237

第一南斯拉夫的毁灭 / 238

“克罗地亚独立国家”、占领政权和积极的反抗
(1941—1942) / 248

共产党的优势(1943—1944) / 257

巩固共产党政权(1945年) / 267

第八章 建立第二南斯拉夫(1946—1953) / 275

根据《1946年宪法》巩固权力 / 276

挫折和铁托—斯大林的分裂(1947—1949) / 285

沿着南斯拉夫的道路迈出的第一步 / 299

第九章 上升时期的铁托的南斯拉夫

(1954—1967) / 311

在东西方之间寻求平衡 / 313

西方市场和自我管理的企业(1954—1962) / 325

市场改革和兰科维奇的倒台 / 333

第十章 铁托的南斯拉夫的衰退时期

(1968—1988) / 349

反对派公开化(1968—1969) / 350

从“克罗地亚危机”到《1974年宪法》 / 356

从半市场经济到契约经济 / 367

外交政策和债务危机(1979—1985) / 374

联邦领导层的失败和经济衰退(1986—1988) / 380

第十一章 种族政治和南斯拉夫的终结 / 385

社会压力和地区关系 / 387

新领导人和新政治 / 400

致命的“十字路口”(1989—1991) / 408

第十二章 种族战争和后继国家(1991—1999) / 423

战火绵延(1991—1995) / 427

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和黑山的战时政治 / 443

斯洛文尼亚和马其顿的战后政治 / 454

后继国家经济和南斯拉夫的遗产 / 461

科索沃:战争终于爆发 / 472

注释 / 483

进一步选择性阅读(英文与德文的相关著作) / 560

索引 / 579

绪言：可行性探究

南斯拉夫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Emir Kusturica)最初想要把其有争议的电影《曾经存在一个国家》看做去纪念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崩溃。他的制片人可能着眼于戛纳电影节(1995年该片在戛纳电影节赢得“金棕榈奖”),之后放弃了该片原著小说的标题,并且选择了更适于销售和更求实的标题:“秘密状态”。实际上,这个非常巨大的阴谋与共产党游击队一起,带领我们渡过1941—1991年的半个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共产党游击队的腐败领导人使共产党游击队保持秘密状态达几十年。他们暂住在老贝尔格莱德要塞下面的一个山洞中,他们相信法西斯主义者尚未被打败,并且他们充满战争狂热。当计划在20世纪60年代最终失败时,该领导人炸毁这个山洞但是未能全部杀死这些游击队员。由于20世纪90年代初南斯拉夫的瓦解和战争,最后幸存者们的才能够向他报仇。

杜尚·科瓦切维奇(Dušan Kovačević)的小说标题避免了这种寓言式的推断,即铁托使南斯拉夫民众保持秘密状态或不了解外部世界,直到他在1980年去世。另外,这部哀伤的、近似亚瑟王传奇的原著可以被翻译为“曾经存在一个国家”。它直接提醒我们,这些虽然相似却独立的各地区被结合成一体。本书专注于南斯拉夫政治统一的起源和试验。第一次世界大战缔造了一个南斯拉夫,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了这

个南斯拉夫,随后缔造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南斯拉夫。

本书的副标题“两次存在一个国家”听起来较少哀伤,并且也提醒我们,即第一南斯拉夫(1918—1941年)先于第二南斯拉夫(1945—1991年)。两者都不值得理想化为某个现代的卡米洛特(Camelot,传说中英国亚瑟王宫廷所在地),甚至超出前南斯拉夫的某些居民“对南斯拉夫的怀念”。但是最初的王室专政和随后的共产党专政也不应被谴责。下列各章间接表明这两个多民族国家具有的实力和弱点。两者都努力实现这种最终使它们困惑的可行性。

2 第二南斯拉夫的血腥终结吸引西方观察家们从目前的僵局去探索南斯拉夫的民族和国家的斗争。但是沉浸在过去会导致令人不快的历史。除了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首先发生流血事件,然后科索沃和塞尔维亚发生流血事件以外,斯洛文尼亚如外科手术般地分离。南斯拉夫后继国家的近来战争,对参与各方自身而言,无疑已经更难以使其自身历史同过去10年相分离。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政治上被操纵的媒体鼓励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这两个最大的民族,把另一方目前的意图看做被排外主义者驱动的19世纪民族主义和重复两次世界大战罪行的一种倾向。太多的塞尔维亚人把该前共和国的最大民族——波斯尼亚穆斯林看做土耳其人或斯拉夫人的变节者。这些斯拉夫人的变节者愿意重新开始奥斯曼帝国对塞尔维亚农民的利用,塞尔维亚农民把皈依伊斯兰教作为惟一的逃脱方法。于是各自的领导人和媒体使另一方目前的居民转变为“想像的对手”。¹他们也鼓励外国观察家去假定旧联盟的复活,这些旧联盟即塞尔维亚人和俄国人、波斯尼亚穆斯林和土耳其人,以及克罗地亚人和德国人的联盟。此后其各方的历史维度已经极大地夸大了。如果不依靠选择性的历史回忆和虚假的类比,那么近来战争的冲击和日常生活的中断使幸存者仍然很难理解目前。库斯图里卡的电影中最英雄的人物是回忆和类比的一个囚犯。本书更有理由尽可能客观地追踪挑战两个南斯拉夫的趋同的、独立的和模棱两可的潮流。

不像1941年纳粹毁灭第一南斯拉夫,50年以后第二南斯拉夫的

瓦解是作为对西方世界的冲击而到来的。自从铁托政权在 1948 年幸免于同斯大林和苏联集团的分裂,大多数观察家们曾经往好处想南斯拉夫的可行性。南斯拉夫对自我管理的企业及其工人委员会下放经济权力。这被广泛地予以标榜,并赢得了进一步的尊敬。铁托的外交在东西方之间巧妙平衡,并且使南斯拉夫成为不结盟运动的创始国和惟一的欧洲成员国。到 20 世纪 70 年代时,像苏联集团中的共产党领导人一样,铁托是一位使太多的中央政府声望绑定于其个人权威的年迈的共产党领导人。尽管如此,开放的边界和显然更高的消费标准使南斯拉夫优于苏联集团的大部分国家。欧洲和美国游客涌入亚得里亚海岸,超过 100 万南斯拉夫人(从外籍劳工到专业人士)在西方被雇佣或学习。学术交流打开了许多途径。和除了苏联之外的任何共产党国家相比,方便的通道、戏剧性的过去和革新的现在吸引了更多的西方学者和研究。1961 年,伊沃·安德里奇(Ivo Andric)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米罗斯拉夫·科尔莱扎(Miroslav Krleža)也是候选人之一。西方读者确实把安德里奇的作品当做南斯拉夫人的作品,而不是意识形态上的社会主义者或种族上的民族主义者的作品,而科尔莱扎的背景使其成为 20 世纪 80 年代东欧(实际上的中欧)持不同政见者的先驱。²

与流亡反对者的期望相反,1980 年铁托去世之后没有出现预示解体的震动。1984 年萨拉热窝冬奥会的成功举行和南斯拉夫运动员、作家和电影导演不断取得的成就,向外部世界表明一切仍然都尽如人意。但是其人口是否持续增长到 2 300 万,并且在 1981 年人口普查中自称为南斯拉夫人的人口比例是否攀升超过了 5%呢?无论如何,特别就美国人而言,联邦似乎是解决其问题的一个多民族国家的适当框架。

本书最后两个章节详述了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积聚的致命问题。1989 年失业率上升超过 15%,通货膨胀加速接近 3 000%。公开的民族纠纷在科索沃爆发,并且至少在波斯尼亚出现,挑战苏联集团政权的那种不同政见自斯洛文尼亚开始蔓延。同时,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试图填补由于铁托去世而在该国的共产党领导层中留下的真空。但是他的塞尔维亚基地外面,他成功疏远了非塞尔维亚族公众及其政治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精英。当斯洛文尼亚的共产党领导层和当地持不同政见者一起抵制一个不成熟的新中央集权的南斯拉夫(这个南斯拉夫就像苏联集团崩溃的共产党政权)时,这个南斯拉夫的瓦解跟着到来。继之到来的是涉及各后继国家的实质上的种族战争,该种族战争占据本书最后一章的显著位置。

一位贝尔格莱德历史学家说:“南斯拉夫从斯洛文尼亚开始,并以斯洛文尼亚告终。”第一南斯拉夫最主要的斯洛文尼亚政治家安东尼·科罗舍茨阁下(Monsignor Anton Korosec)认为:“即使一个有缺陷的南斯拉夫也比没有南斯拉夫要好。”铁托的斯洛文尼亚族理论家爱德华·卡德尔(Edvard Kardelj)已经部分构思了第二南斯拉夫的联邦结构,从而排除1939年内部边界的重新调整曾许诺的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较大的行政区域。如果没有斯洛文尼亚在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之间建立一种更广泛的平衡,第二南斯拉夫的六个联邦共和国和两个自治省的框架就不会那么容易地幸存下来。塞尔维亚人在克罗地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科索沃省构成重要的少数民族。米洛舍维奇曾经在塞尔维亚发动种族政治以挽救共产党政权,现在种族政治再度流行威胁或似乎威胁那些少数民族。由于历史的限制,在1991—1992年,塞尔维亚人被说服去把克罗地亚新的反共领导层强制驱逐出被匆忙承认的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新国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波斯尼亚穆斯林领导层恢复黑塞哥维那的德语拼法,以便强调同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身份的决裂。)马其顿也宣布其独立。黑山与塞尔维亚在一个残余联盟中并驾齐驱,塞尔维亚现在包括以前自治的科索沃和伏伊伏丁那省。第二南斯拉夫不复存在。

一个不可避免的南斯拉夫的主张

“前南斯拉夫”代价高昂的告终并不令人惊讶地赋予这一观念以新的生命,该观念即:“前南斯拉夫”的建立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许多熟知内情的人现在把这个以两个化身幸存70年的国家称之为人为的产物,它的缺陷使其崩溃不可避免。一种塞尔维亚人的说法把第一南

斯拉夫视为列强在 1919 年巴黎和会上强加给其战时盟友塞尔维亚的一项责任,把第二南斯拉夫视为克罗地亚共产党人铁托和反塞尔维亚的苏联强加的一个国家。而一种克罗地亚人的说法则把南斯拉夫的瓦解引证为一战后《巴黎和约》误助建立第一南斯拉夫的最终证据。如果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所提出的民族自决原则证明多民族的哈布斯堡王朝的解体是正当的,那么在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的王国(第一南斯拉夫)中怎么能够容纳另外的原则?在局外人中,一些哈布斯堡王朝历史学家被这种观点吸引。许多不熟悉巴尔干历史的西方新闻记者和政治家们已经欣然接受一个更值得商榷的观念,即该地区存在着“古老对立”。如果原始的仇恨已经使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自奥斯曼帝国征服起就激烈争吵,那么它们为南斯拉夫近来的悲剧提供了一个简单解释,并且为避免任何重大卷入提供了一个现成的理由。

与自 20 世纪 50 年代已经占优势的关于南斯拉夫的普遍共识相比,这些观点听起来多么不同。大多数南斯拉夫专家学者(包括本作者),简单地假定这个国家将要并且应当继续存在。铁托的南斯拉夫的官方批准的历史学家则更进了一步,他们认为他们那种南斯拉夫的建立不可避免。像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一样,被不可避免的历史进程在起作用的主张所吸引,像其苏联同行一样,他们寻求解释较长期的武装力量不只是战争的幸运,而是如何为他们带来权力。然而,代替在其领域中阐释尽早时刻的工业资本主义的起源,他们赋予南部斯拉夫民族的不可避免的聚合以首要地位,这种不可避免的聚合使南斯拉夫联合。六个联邦共和国中的每一个——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马其顿和黑山都有其自己的历史,都分离于其他共和国。但是,它们寻求任何政治或经济的优势地位,这种政治或经济的优势地位来自将屈从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差别。这种倾向据说是毁灭第一南斯拉夫的致命缺陷,而不是“资本主义剥削”。其独裁主义的演进和强加于其他民族的大塞尔维亚的不合理要求主要被归咎于贝尔格莱德资产阶级,有时萨格勒布资产阶级被指控为帮凶。作为回

报,官方的塞尔维亚历史学家能够在德国人(很少被称为纳粹)和“克罗地亚独立国家”(NDH)的法西斯政权之间分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罪行责任。就整个南斯拉夫历史学而言,塞尔维亚“切特尼克”兵团当时被认为仅仅应对他们反对共产党游击队和勾结夸大的纳粹侵略者负责。像在苏联的同行一样,更年轻、更有才能的历史学家避免研究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和战后时期的南斯拉夫史。

在压力之下,关于撰写单卷本南斯拉夫史的计划不久达成了共识。而关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四卷本的努力未能超越适于 1800 年之前较少争议时期的最初二卷本的努力。在自由主义改革的高潮中,这项新工作开始于 1966 年。但是弗拉基米尔·杰吉耶尔(Vladimir Dedijer)等人所著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的《南斯拉夫简史》(*New York: McGraw Hill*, 1974)直到 1972 年才完成。那时,铁托已经结束了自由主义时代及其对政治宽容的强调。如果撰写 19 世纪和 20 世纪两章的两位作者没有暗示是军队而不是外国统治和资产阶级剥削妨碍了统一,那么该卷的塞尔维亚和黑山原作者可能较少地引起争议。受尊敬的萨拉热窝历史学家米洛拉德·艾莫希奇(Milorad Ekmecic)认为,这种宗教,特别是克罗地亚天主教的政策,已经对统一和世俗现代化构成严重障碍,否则世俗现代化应当已经更成功地从一门共同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得出。作为铁托的战时同事和传记作者,获得声誉之后,杰吉耶尔从一个闲不住的记者转为历史学家。他的章节强调了克罗地亚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对塞尔维亚人的罪行。他攻击书中关于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资产阶级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种下的祸根的史实太过粗略,以至于不能令人信服。到 1979 年时,塞尔维亚历史学家莫姆契洛·塞切维奇(Momcilo Zecevic)召开了一次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南斯拉夫初步统一的全国范围会议,批判关于南斯拉夫主张的意识形态共识。³

战后关于南斯拉夫的南斯拉夫夫人学术成就发展不应当进一步地阻止我们。斯特万·帕夫洛维奇(Stevan Pavlowitch)和伊沃·伯纳克(Ivo Banac)已经提供了整个 20 世纪 70 至 80 年代的略有不同观点的审慎指南。⁴关于南斯拉夫不可避免地正在崩溃的这种共识,确认了关于两

次世界大战和两次大战之间时期的更主动和更准确的报告，这些报告最初来自克罗地亚族历史学家，然后来自塞尔维亚族历史学家和其他南斯拉夫的历史学家。像脚注将证明的那样，如果没有这些历史学家，那么该书不可能会撰写出来。

这些著作都不具有以下三部著作的政治影响，这三部著作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期间主要出于辩论目的而撰写的。为数众多的关于该国崩溃的西方报告引用了“塞尔维亚科学学会”的 1986 年《备忘录》，虽然其内容不太确切。这三部著作反对这种“内容不太确切”，据说大体上战后塞尔维亚在南斯拉夫曾遭受这种弊端，并且塞尔维亚人特别在科索沃省曾遭受这种弊端，从而这种弊端为米洛舍维奇的民族主义运动提供了攻击手段。较少在西方宣传的是被禁止但仍被传播的克罗地亚未来总统弗拉尼奥·图季曼(Franjo Tudjman)的著作，他的著作收录了他认定的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克罗地亚所遭受的不公正。而贝尔格莱德的沃伊斯拉夫·科什图尼察(Vojislav Kostunica)和科斯塔·查沃什基(Kosta Cavoski)撰写的著作，谴责了被强加于战后塞尔维亚的共产党政治垄断的方式。⁵这三部著作以不同的方式都质疑了铁托的南斯拉夫的合法性，并且这些著作在铁托的南斯拉夫的解体中发挥了作用。但是这三部著作也提出了任何单一的南斯拉夫是否是合法国家的问题，并且含蓄地指出其解体不可避免的前景。

寻求一个切实可行的南斯拉夫

接下来的章节猜想了所有的必然性。这些必然性承认了这些民族的独立的文化遗产和文学密切相关，但是忽视其独特本质。这些简短的故事反而集中于这些民族如何在毗邻的土地上相互融合和移居，并且于 20 世纪其两次统一之前，以及在此期间他们彼此在何种情势下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实现交融。更特别的是，从历史观点上说，他们是谁并且谁是他们的领导人？在其领导人中，铁托计算在内，其他人也计算在内。是什么结构和主张使他们团结起来或分离了他们呢？就这些结构来说，我们首先意指国家建设的要素，即政治文化和法律体制超过

- 7 种族差异。我们也专注于社会经济或宗教制度超过专注于阶级关系，并且专注于同近邻的战争或其他交往超过专注于同遥远强国的战争或其他交往。前者通常比后者更重要，这支持了一位主要的西方民族主义学者的论点，即：对凝聚的种族特性演变成持久的民族意识而言，至关紧要的三种影响力已经是国家建设经历、宗教组织和军事现代化。⁶这三种影响力可能超过社会经济结构，在使两个南斯拉夫联合和使其分裂中都起了作用。

就这些主张来说，我们首先意指适于一个新的南部斯拉夫人国家的浪漫解释，该国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形成。在 1914 年之前，这些主张遭遇了一个缓慢衰落的奥斯曼帝国和一个缓慢现代化的哈布斯堡王朝。在 19 世纪之前，这两个帝国在将近 300 年中几乎已经分割了这块人口稀少的整个领地。到 19 世纪末，当帝国对他们的控制削弱或改变其立场时，当地人口不断增长。民族的共同特权而不是个人权利的共同帝国遗产，将依然给当地的独立渴望留下永久影响，这种共同的帝国遗产在近代早期欧洲国家中也是普遍的。⁷然后，第一次世界大战迅速消灭了这两个帝国。像铁托的游击队对第二南斯拉夫的建立那样，已独立的塞尔维亚的军队对第一南斯拉夫的形成是必不可少的。尽管如此，这些主张在两个南斯拉夫的形成中都很要紧。安德鲁·沃赫特尔(Andrew Wachtel)关于南斯拉夫主张的有说服力的研究发现，这个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家寻求建立一种单一的、假想的南部斯拉夫文化，这和战后共产党政权依赖于一种统一的意识形态几乎一样。⁸这两个南斯拉夫也吸收了这种浪漫观念，即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是一个民族的有机要素。

与第一南斯拉夫相比，建立第二南斯拉夫最初似乎造成较少的复杂情况。游击队的事业使来自所有组成民族的民众联合起来去为胜利一方继续战斗，虽然阿尔巴尼亚人和匈牙利人数量非常少。其共产党领导层从而能宣布成立一个在该党的集中控制下的超民族的、苏联式的联邦。但是当这些共和国获得或夺取来自中央的重大权力时，联邦中的势力均衡成为一个关键性问题。这些要求和反要求再度浮现，它

们已经对抗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际的第一南斯拉夫。

两种现实动机和外部安全的承诺也支持一个单一的南斯拉夫。在构建实现其所需要的体制结构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欧获得了成功,这两种现实动机和外部安全的承诺与这些成功的要素是同一系列。第一个现实动机是对代议制政府的渴望。无疑地,该现实动机能够在各省区和首都之间获得某些可接受的平衡,即联邦制结构或相反的结构。1921—1974年,多达六部宪法和一个邦联协定(1939年)寻求在贝尔格莱德和南斯拉夫其余地区之间获得这种平衡。第二个现实动机是经济一体化的吸引。经济一体化预示了更大的国内市场和国际贸易中更大的相对优势。国际贸易在20世纪20年代短暂复兴,但是直到50至80年代才走向繁荣。另外,像北约为西欧和苏联集团所做的那样,一个单一国家也为南斯拉夫各组成部分与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环绕其边界的七个潜在敌对邻国提供了更安全的关系。

这些国家建设动机中的三种动机——政治的、经济的和军事的——在提升两个“真正存在的”南斯拉夫的可行性中都发挥了作用。就全部优势而言,同它们作斗争的是适于建立一个单一民族国家的三种浪漫的19世纪主张——大塞尔维亚、大克罗地亚和一个基于这种假定的南斯拉夫,该假定即至少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是一个民族。据假定,在1914年之前,任何民族国家具有同化更小民族的潜力,不是通过武力,而是通过成功的欧洲式现代化的吸引力,这种欧洲式现代化应该是从政治统一得出的。该民族国家的新的文化在其发展道路上将同化所有民族。这种新的高度文化对日益有学识的人口而言是世俗和开放的。尤金·韦伯(Eugen Weber)已经证明,这种情况事实上就是19世纪法国的案例。⁹1914年之前的塞尔维亚看起来沿着相同的轨迹开始。然而就一个单一国家而言,容纳三种国家观念将决不容易。第一南斯拉夫寻求这样一种合成法,第二南斯拉夫寻求超越它。一个更大的多种族的南斯拉夫国家将需要但从未充分确定共同的公民权和个人责任意识。这种意识甚至压倒多数人的种族起源。罗杰斯·布鲁贝克(Rogers Brubaker)称这种意识为1914年之前

法兰西的真正特性。¹⁰

然而,就两个南斯拉夫的大部分历史而言,这些民族的日常相互影响减少了他们的种族隔离。就此方面来说,一个共同国家的经验对关于民族国家的三种浪漫设想中的任何一种都保持优势。在它发挥不了作用的地方,南斯拉夫的可行性就会被威胁到。使这种威胁成为毁灭性的两种外部冲击,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共产党政权在 1989 年的连锁性失败。

第一章 帝国和分裂的边疆 (800—1800)

现代之前的一千年,与 20 世纪诞生的两个南斯拉夫国家的发展有什么关系吗?或者,与适用于一个南部斯拉夫国家的 19 世纪主张有什么关系吗?到公元 1800 年时,后来成为南斯拉夫的这些地区已经比它的地中海或中欧邻国遭受了更多的战争和强迫移民、外国干涉和内部分裂。这些地区没有机会分享在 18 世纪席卷大部分西北欧的经济增长。在中世纪开端到近代早期结束的一千年间,政治混乱加深了经济衰退。

为了理解这种混乱,我们首先着眼于散布在贫瘠地貌上的少量人口,他们可怜地匹配于仅服务于外国军队的现代以前的商业。即使文化上接近的本地民族,也发现他们被广泛孤立于其他民族。然而在这些民族被混合的地区,他们积极地和平共处着。缺乏证据证明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种族敌视。除了少数学者以外,一些新闻记者和政客已经惯于以此来解释造成第二个南斯拉夫国家毁灭的近来战争。塞尔维亚人(Serbs)、克罗地亚人(Croats),最后是波斯尼亚人(Bosnians)在中世纪短暂地建立了能维持下去的民族国家。虽然它们的版图重叠,但是它们没有彼此争斗,相反这些国家由于内部的虚弱和外部的对手而消亡。

奥斯曼帝国(Ottoman)和哈布斯堡帝国(Habsburg)的强大军队分

10 别从东部和北部推进,使这些民族国家没有一个能够幸存地进入近代早期。1389年奥斯曼帝国在科索沃(Kosovo)击败塞尔维亚军队证明了这是一次决定性的并且被长期记忆的战役。在其他方面,这两个帝国主要通过它们强加的制度框架留下其印记。这两个帝国都拥有自己的一套相关制度,但是它们都没有在其巴尔干半岛(Balkan)的边界内始终如一地实施。结果它们依赖于地方市政当局的特权而不是其多民族的中央集权控制。在这种长期的帝国体制下只能加深政治分裂。在起初强加令人难忘的统一制度之后,奥斯曼帝国允许不同的制度和统治集团存在于塞尔维亚(Serbia)、马其顿(Macedonia)、黑山(Montenegro)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Bosnia-Hercegovina)。就哈布斯堡帝国的领地而言,我们所知的成为目前克罗地亚(Croatia)和斯洛文尼亚(Slovenia)的地区被分成四个或者更多的行政管辖区域。在民事或军事统治下的制度存在着决定性的差异。

像我们在本章末尾将要看到的那样,帝国分裂的模式存在着例外。在多民族帝国的庇护下,地区之间有限的商业联系发展着,并且甚至超越这两个帝国之间的交流。一个独立的杜勃罗文克(Dubrovnik)、奥斯曼帝国的萨拉热窝和成为伏伊伏丁那的哈布斯堡帝国领地是焦点。为了它们的民族复兴,并且为了一个南部斯拉夫(或南斯拉夫)的想法和经济(即使还不是一个国家),中世纪时期失传的本土政治体制中几乎不存在文化联系现在产生了基础。这两个20世纪的南斯拉夫国家仍将不得不与历史遗产的多样性和被树木繁茂的巴尔干山脉造成的地理分裂而斗争。

山脉第一,水最后

像已故的弗雷德·辛格顿(Fred Singleton)指明的那样,在这块几乎不比英国大的25万平方公里的地域内,地理特征的差异是壮观的。广布不适于耕种的高地并且缺乏适于大宗贸易的广阔河流网络,使得其人口密度显著低下。城市中心和精耕农业的缺乏持续到19世纪。尽管其人口在18世纪得到增长,但到1800年时,南斯拉夫的人口数量

总共不超过 500 万。人口密度大致为每平方公里 20 人。E. L. 琼斯 (E. L. Jones) 将这种低水平的人口数量和城市的缺乏与近代早期西欧的较高密度相对照。¹这两种缺乏加强了地理屏障。地理屏障如果太低就不能防止外部渗透,但是如果太高,就不能允许任何一个种族同另一种族的广泛融合。

迪纳拉山脉 (Dinaric) 荒凉而且引人注目。它紧邻达尔马提亚没有遮蔽而易受攻击的海岸线和类似杜勃罗文克这样高度文明的城镇。从最早的年代,这些崎岖的山脉和高地就已分离而不是被连接。这些山脉和高地从西北绵延至东南,在一些地方伸展到距亚得里亚海 (Adriatic sea) 几英里处。像费尔南·布罗代尔 (Fernand Braudel) 给迪纳拉山脉起的绰号那样,这个“垂直的北部”使地中海的政治影响局限于海岸线内,并且留下分散的内陆定居点。这些定居点彼此隔绝并且没有足够的食物供应。²像地中海的其余地区一样,亚得里亚海滨缺乏鱼类和适于耕种的陆地。和地中海的其余地区不同的是,亚得里亚海滨并不缺乏树木。直到近代,其造船业一直很繁荣,从中世纪早期它就帮助达尔马提亚的港口同更为广阔的欧洲世界相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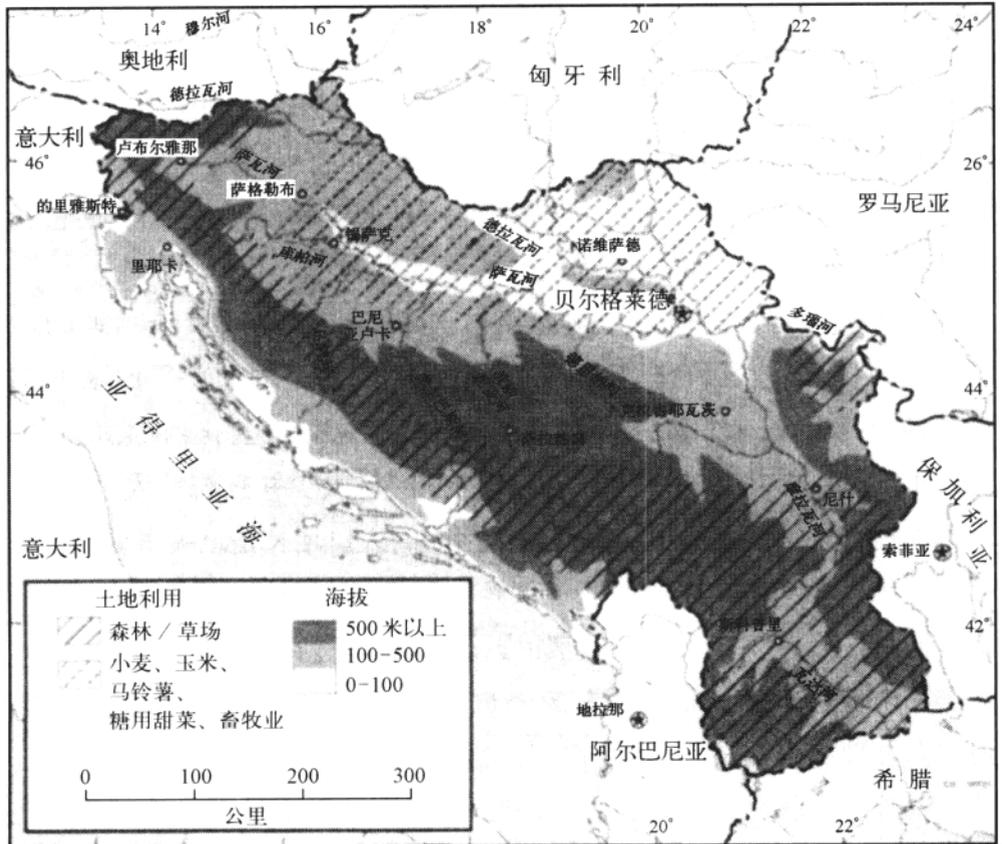
11

最大和最富饶的低地是前南斯拉夫最盛产谷物以供给高地的地区。然而,海滨地区和该地区之间没有联系。富饶的北部平原从西部克罗地亚延伸到东部塞尔维亚。该平原具有这种工业化前的潜力,去连接东部和西部并且供给南部。但是这些河流太少并且流域太小,以至于不能提供大宗贸易的机会。而这对西欧的人口增长是至关重要的。

迪纳拉分界线从波斯尼亚继续延伸到海滨,即杜勃罗文克的南部。因为迪纳拉分界线转向南方,也加强了基督教东西两部分之间的边界。海滨和内地之间存在着的贸易、家畜放牧和其他往来,趋向于通过山脉、河谷向北部和南部移动,从而使东西部之间的经济联系降到最低限度。然而对外国军队和国内居民而言,突出的高地几乎不是不可逾越的。他们的迁移使种族和宗教的界线模糊,吸引或者推动信奉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和信奉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的祖先进出这一地区。即使当他们在同一地区定居时,崎岖的高地也使他们被隔绝于分离的村庄中。

山脉

前南斯拉夫大约 45% 的领土至少高出海平面 500 米。尽管尤利安阿尔卑斯山脉(Julian Alps)延伸进入斯洛文尼亚,巴尔干山脉延伸进入马其顿,但是迪纳拉山脉及其周围地区仍然是突出的。迪纳拉山脉向东南的一脉,从克罗地亚延伸到黑塞哥维那和黑山。很久以来,迪纳拉山脉东南脉就因高原喀斯特(karst)^①地貌而出名,喀斯特地貌足足覆盖了地图 1.1 中地区的 10%。其石灰岩矿砂沉淀进入地下河床中。对任何形式的耕种而言,这只留下强于不毛之地的贫瘠土地。在夏季,取用地下水的通路至少维持了高地的家畜放牧。然而,波斯尼亚



地图 1.1 前南斯拉夫的自然地理和土地利用

① 由于腐蚀而产生裂隙、落水洞、潜流和洞穴的不规则的石灰岩地区。——译者注